

湖南大学青年社科学者文库

刘舸 著

# 他者之镜：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日本

TAZHEZHJING:

ZHONGGUODANGDAIWENXUEZHONGDERIBEN

湖南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青年基金项目资助《他者之镜：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日本》(06JC75011-44006)

他者之镜：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日本

刘 舸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 内 容 简 介

以涉及日本题材的中国当代文艺作品为研究对象,分析各个时期、各个地区日本形象的变迁,以及形成此形象的文艺生产机制、民众文化心态的特点,着重探讨其文化和现实意义。本著第一次对涉及日本题材的中国当代文艺作品进行系统的研究,第一次将祖国大陆、香港、台湾的涉日作品作了横向和纵向比较,并从文艺角度对当代中日关系进行了梳理和反思。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者之镜: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日本/刘舸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667-0187-9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9651号

---

### 他者之镜: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日本

Tazhe zhi Jing: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zhong de Riben

---

作 者: 刘 舸 著

责任编辑: 肖立生 责任校对: 全 健 责任印制: 陈 燕

特邀编辑: 高 丽

印 装: 长沙利君漾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6开 印张: 13 字数: 234千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7-0187-9/I·67

定 价: 32.00元

---

出版人: 雷 鸣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 410082

电 话: 0731-88822559(发行部), 88821594(编辑室), 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 0731-88649312(发行部), 88822264(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hnupress.com> 电子邮箱: [pressxls@hnu.cn](mailto:pressxls@hnu.cn)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 序

王向远<sup>①</sup>

2001年起，我担任北师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东方文学与中日比较文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指导工作，如今已经有十多个年头。在这十几年中，带的博士生大约已经有二十几名，获得学位后，他们几乎都在大学及研究院所从事专业的研究与教学。刘舸是我头几年带出的学生之一。记得她是2002年从湘潭大学应届硕士毕业后直接考入北师大来的，三年后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到湖南大学文学院任教。算起来，刘舸毕业已经有六七年，在我的学生们常常自称的“王门弟子”中，她可以称得上是师姐了。六七年时间固然不算太长，也不能说短。有好多事情慢慢淡忘，但也有一些却一直忘不掉。比如，当年刘舸与她的博士同学阮红莺，常常一起到我这里聊天，或者一起吃饭，那情景至今仍然记得。两位身材同样娇小，又不乏干练、爽利和巾帼气的女生，看上去仿佛一对姐妹。刘舸是典型的带有湘女特色的女高音，阮红莺则是带有外国人（越南）口音的女中音，搭配起来有一种特殊的乐感。

但我不能忘却的，除了刘舸那欢快的声音，还有她那充满阳光的表情。三年中，我所看到的刘舸始终是乐观的、开朗的、无忧无虑的。然而，实际上，那时她却承担了一个二十四五岁女生、一个独生女难以承担的困难和压力——作为退休职工的父母都患上了重症，没有医疗保险，数次的住院、数次的手术。……我记得当时刘舸曾数次跟我请假，常常在电话中说：爸爸又得住院了，或妈妈又要做手术了，我要回家安排安排……听上去，那声音平静而坚毅。但是，当我逐渐了解一些具体情况后，我明白了那时刘舸所面对的困难、需要承受的压力有多么大！但无论如何，刘舸把所有的困难都克服了，把所有的难关都闯过去了。我所听到的，依旧是她那欢快的、阳光的声音，我所看到的，依旧是那乐观的表情。后来，我的学生们，无论是硕士生

---

<sup>①</sup> 王向远：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全国东方文学学会会长，著有《王向远著作集》（全十卷）及各种单行本著作20部、译著十余部。

还是博士生，在学期间遇到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困难的，真不少见。面对无奈与无助，学生们的读书生活常常会受到影响。每当这种时候，我就想起了刘舸，我会把刘舸的事情讲给他（她）们听，我会说：你们的困难和压力再大，比刘舸师姐当年遇到的困难还大吗？

在那样的情况下，刘舸的学业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在短短的三年中，如期完成了博士论文，如期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当然，这除了她的艰苦努力之外，更得益于她的天赋聪颖。记得华东师大的钱谷融教授曾说过：导师带学生，是“来料加工”，关键是要看来的是块什么“料”。我对钱先生的这一说法很有共鸣。刘舸无疑是块好料，悟性很强，干活麻利，有效率。虽然她的本科、硕士在读的并不是特别的名校，当年招生的时候，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她。这除了她的硕士导师黎跃进教授的力荐，还有她在硕士阶段发表的十几篇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那些文章学术价值与思想含量的多寡又当别论，但起码证明了她是会写文章的，而且笔杆子是硬的。

笔杆子硬不硬，最终要体现在博士论文上。而博士论文的价值大小，首先在选题。我常跟学生说：选题有两种，一种是好写的，但写不好；一种不好写的，但可以写好。所谓“好写的”，是说这个题目别人都写了很多了，语料（材料）多的是，不太费劲就可以写出很多的字数来，但是要有新意就难了，要有全面的创新就更难了，所以说“写不好”；所谓“不好写的”，就是指该选题别人很少研究或没有研究，材料是原始性的，收集整理材料需要付出大量艰苦的劳动，写起来耗时费力，但这样的题目一旦写成，就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就会为读者展示出一个新的知识领域，就会提出作者新鲜的思想见解。出版成书，就是一个新的知识产品。

以这样的观点来衡量，我觉得刘舸的《他者之镜：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日本》是那种“不好写”的题目，但是她最终“写好”了。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的学问研究发展很快，在今天看来，这样的题目不算太新鲜了，但是十年前，这样的题目无论在选题的填补空白性、还是选题的角度和方法论上，都是颇为新颖的。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这样的系统的学术著作都没人写过。不必说，“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日本”这个题目很大，它所涉及的各类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是需要“大题大作”、写成大部头的。然而，刘舸的这部书篇幅并不大，我想这也许主要不是因为材料的收集和掌握不够，而是为了凸现博士论文的“论”，为了不把博士论文写成“史”，而把许多具体的材料割爱了，因而从细节上、细致性上看，尚有许多未尽之处，但这也是难以苛求的。从学术史上看，某领域中最初的几部著作，题目都很大。例如，在中国

文学史研究领域，一百多年前那些冠以“中国文学史”字样的著作，今天看来题目都太大了，但篇幅常常只有十几万字。在今天，这样的“中国文学史”，恐怕中文系普通本科生都能写出来，但在那时候，却是极为不容易的。一个学术领域尚处在拓荒阶段的时候，需要从无到有，先把总体的知识建构做出来，然后逐渐地将研究分支化和细化，这是一条必然的和正确的路径。我想，刘舸的这部书在总体知识建构方面很好地达到了这一要求，但她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任何人都不可能），这也为今后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提供了余地和可能。我觉得，在这个领域中，今后完全可以写出更多的文章和著作。这几年，我让新入学的擅长日语的博士生们系统研究“日本文学与北京”、“日本文学与大连”、“日本文学与西安”、“日本文学与天津”、“日本文学与哈尔滨”这样的题目，有的已经完成，有的正在进行中。这些都是对于以中国城市空间为中心的日本“涉外文学”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在刘舸研究的延长线上延伸出来的，或者说是在其“背面”上进行的（刘舸研究的主要是中国文学，而这些题目所研究的则是日本文学）。这样的题目日本人没有做过，但我们中国人要做。这样一来，中日文学关系的研究就会逐渐地被细致化、深化，“小题大做”成为可能。

为一本书写“序言”，需要对这本书做出学术价值判断吗？照理说是需要的。以上我写下的这些话，也难免价值判断的成分和色彩。但我作为刘舸的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我不打算将本书的序言写成一篇书评。至于论文写得怎样，我想最有发言权的，还是那些懂行的读者；最有判断力的，还是时间和未来。不过相关的事实也必须提到，就是刘舸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可。据我所知，前些年，刘舸在这部博士论文基础上申报的国家及教育部的社科基金研究项目都先后被批准立项了。这应该是对她的研究最有力、最硬性的肯定。可以说，这部博士论文及相关的项目研究，为刘舸的学术道路铺垫了很好的基础。以刘舸的智慧和努力，只要能够坚持将精力集中于学问，只要再进一步细致，只要沉潜下去，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就能不断地写出新的、更好的作品来。这是可以相信和期待的。

现在刘舸的这部论著就要出版，作为导师，我有责任对论文选题写作的前后背景向读者略作交待，这既是刘舸对我的托付，也是为读者提供一点参考。故冠序文于上。

2012年2月15日

于北京·回龙观

# 目 次

## 绪 论 中国文化中的中日关系与日本形象

- 第一节 日本形象构建的前提和基础····· 2
- 第二节 中国文学中日本形象研究的意义····· 8
- 第三节 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日本形象的演变 ····· 14

## 第一章 意识形态视野中的日本

- 第一节 阶级论的枷锁：凶残的鬼子与反战的士兵 ····· 27
- 第二节 他中的自我：十七年诗歌中的“红色”日本 ····· 33
- 第三节 “红太阳”意象：从“文革”文学中的日本看国人的  
世界观 ····· 44

## 第二章 新时期文化透视中的日本

- 第一节 日本形象的重构与民族文化反思：新时期抗日文学的  
重新书写 ····· 52
- 第二节 “日本”与“日本人”的分离：当代留日文学中的日本 ··· 60
- 第三节 走近日本精神结构：从中国旅日游记变迁体验现代性  
生成 ····· 69

## 第三章 大众媒介中的日本

- 第一节 中国民族精神的凸显：新时期电影中的日本 ····· 78
- 第二节 视觉化的激情：当代漫画中的日本 ····· 92

## 第四章 五十年殖民地的日本印痕

- 第一节 反抗日本殖民的见证：台湾战后文学中的民族意识····· 107
- 第二节 殖民地印痕：台湾当代“皇民文学”论争····· 115
- 第三节 台湾战后小说中的殖民记忆：以中日战争为中心····· 129

## 第五章 比较视域中的日本

- 第一节 殖民情结与战争记忆：台、港当代文学中的日本情感比较…… 144
- 第二节 现当代留日文学比较：以日本女性形象为中心…… 159
- 第三节 难以抹去的记忆：海峡两岸中日战争书写比较…… 165

## 第六章 日本战争文学的书写

- 第一节 关于日本战争文学…… 173
- 第二节 战争文学中的日本叙述…… 178
- 第三节 战争文学中的中国书写…… 186

参考文献 …………… 195

后 记 …………… 199



# 绪 论

## 中国文化中的中日关系与日本形象

在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北角，中国的东方，有一个像日语字母“う”形状一样的岛国，那就是中国的邻国——日本。

日本，一个传说有天照女神庇佑的群岛之国，一个春天开满绚烂樱花的美丽国度。

日本，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居，历史上曾经多次被中国文化滋养，它保存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很多精髓，甚至进一步将其艺术化，如服装、建筑、书法和围棋。

日本，面积不及中国的二十五分之一，近代以来却用炮火把中国逼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历史学家郭廷以曾说：“两千年来，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至大，百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中国者独深。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创痛，虽然不能说全部来自于日本，但实际上以日本所给予的最多最巨。”

今天的日本，与中国关系暧昧异常：一方面官方称中国是友好合作伙伴，另一方面民间却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一方面承认台湾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大肆与台湾进行实质性的官方往来，甚至一些右翼势力与“台独”势力同流合污，妄图延续“五十年殖民梦”；一方面，一些日本人来到中国，为过去的侵略行为向中国人民忏悔，另一方面，很多日本人却从不反省自己的野蛮行径，相反，其“冤者复仇”心态比“罪者负疚”的心态更甚。在日本国内，据民意调查显示：1980年时对中国抱有好感的日本人占80%，80年代末只有50%多一点；在90年代持续下降，现在已低于50%，而对中国有不好感觉的人数在上升。而中国的调查数据与日本

的数据走势相似。

今天的日本，亚洲最富裕的经济大国，它是中国外交和贸易都绕不开的一个关键环节。中国和日本，一个拥有丰富资源，一个拥有先进技术；一个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个成为全球金融和制造业中心。两国都对对方有着极大的需求。然而，同是黄种人，同属于大中华文化圈，甚至文字都曾经一样的大和民族，却让我们感到非常陌生、隔膜和困惑。中国人理解日本人，比理解白皮肤的美国人、欧洲人还要困难。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曾用“暧昧的日本”来形容日本近代以来的文明，“暧昧”两字经典地概括了日本和日本人的气质。在中国人的眼里，日本和中国地理位置虽近，但精神气质却相差甚远，中国人看日本，更多是雾里看花、扑朔迷离。

其实，从很久以前，中国就开始注意到日本这个邻国，在很多历史文献与诗文中记载下了日本的风俗和生活。到了当代，由于两国特殊的历史和重要的关系，中国涉及日本的文学、文艺更是数不胜数，这些文本记录下了中国人心目中的日本形象。异国形象是民族集体心理的一种表现，它们说出了创作者的精神、心理结构，能揭示出对异国的先入为主的看法——集体描述。并且通过文学的传播，让此描述更加深入民众心理，进一步地巩固了社会集体想象。所以，特定的历史时期，会有其特定的文化语境，我们对他是不能任意说、任意写的。而在那些塑造了典型的文本中，形象可以说已被部分程序化了。对中国文学中日本形象进行形象学分析，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中国民众心目中日本形象形成的前提和基础。

## 第一节 日本形象构建的前提和基础

### （一）中日关系：构建日本形象的外部环境

日本形象的构建存在很多因素，但是最基本的前提是中日关系，它是日本形象形成的外部环境。只有中国和日本存在交往，才有可能产生中国民众以及中国文化中的日本形象。而交往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国人眼中日本形象的好坏。在各种交往方式之中，最重要的交往方式是政治关系，毕竟官方关系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从历史上的日本形象看，唐宋时期中日关系良好，日本来中国学习生活的人很多，这时期表现出的日本形象正面多于负面。而元朝以后，由于中日两国发生了战争，同时出现了倭寇，日本负面形象增

多。到近现代，日本形象更是由两国政治关系决定，八年抗战中的鬼子是最具典型的代表形象。

当代，两国官方关系仍然是形成日本形象的首要前提，建国十七年以及“文革”时期，两国政治关系使得日本形象呈现两级化——友好的日本人民和敌对的日本反动统治阶级。20世纪80年代，是两国的政治蜜月期。这个时期，中国整个社会充满称赞日本成功、学习日本的气氛，喜欢日本的中国人比率高出了讨厌日本人的比率，这时期的日本形象是友好而和平的。90年代初期以后，伴随着冷战状态的结束，中日政治关系走向复杂化，日本形象也出现了复杂化、多样化。

中日官方关系虽然对日本形象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不是日本形象形成的全部因素，民间交往也是形成日本形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实际上在中日关系最为冷淡的时期，也没有断绝过民间的交往。“古代中日民间交流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佛教僧侣的交流，一是海商的贸易活动。中日海商的贸易活动在各个历史时期时断时续，有着不同的表现。佛教僧侣的交流几乎贯穿于整个中日古代关系的发展过程。僧侣的交流是全方位的，他们的活动遍及中日交流的各个方面。通过僧侣的交流，不仅传递了佛教，也传播了中国文化。”<sup>①</sup>正因为这种交流的存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商人和僧人形象非常多，商人多负面形象，而僧人多正面形象。这些形象都是在具体交往中形成的。

当代中日民间交往的渠道呈现多样化，有文化交往，有经济交往，也有私人交往。在文化交往方面，如日本的流行音乐、流行漫画等在中国盛行，富有传统美意识、感性和现代特点的日本流行文化正在冲击和影响着中国的青少年一代，这无疑会影响中国人对日本形象的形成；在经济方面，随着两国人们经济交往的增多，“经济大国”、“先进技术”、“家电产品”等代表日本的现代形象在中国民众心目中形成，与之相关联，“彬彬有礼”、“勤奋”、“工作热情高”、“富于创造性”、“集团精神”等是日本人现代形象的一面；而中日民众之间的私人交往，能产生个人心目中的日本人形象，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做的一次调查中显示，有日本友人的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印象好过没有日本友人的中国人，类似如“日本人招待我们礼貌、和善”，“日本人办事讲求效率，工作态度严谨、团结，环保觉悟高”等是他们对日本友人的评价。

<sup>①</sup> 张哲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页。

## （二）文化心态：构建日本形象的内部土壤

文化心态是构建异国形象的内部土壤。不同时期的中日关系形成不同的日本形象，而无论怎样的日本形象都是中国文化认识日本的思维方式。中国民众的文化心态能深刻影响中国对日本的认识，而对日本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日本形象的描绘。以客观条件而论，中国观察、认识、研究日本，具有其他国家和民族所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理当成为世界上研究日本水准最高的国度。但中国对日本的认识，至今仍落后于欧美等地区。相反，日本认识中国虽然较晚，却成为举世公认中国以外对研究中国最为重视，同时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的国家。这种局面的产生与两国的文化心态上的差异有着直接联系。我们从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可以看到中国民众的文化心态对构建日本形象产生的作用。

### 1. 中日相互认识的变迁

古代中国在公元初期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的文明中心，高度发达的文化以及相对完善的政治、经济制度，让其在古代东方国家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同时期的日本则处于原始蒙昧阶段，落后于中国。这种巨大的文化落差，让唐朝以前的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具有两个层面：

一方面，文化优势让古代中国能站在较高的观点上，对日本进行从容的观察和了解，大量关于早期日本情况的记录出现。如《山海经》、《史记》中的有关日本记载，尽管还很朦胧模糊，却已表明早期中国对东海邻居的关心。随后的《三国志》、《汉书》、《后汉书》则把这种朦胧认识明确化，第一次对当时中国人所能目击到的日本列岛状况进行了详实记录，中国人这一时期对日本的认识居于世界绝对领先地位。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古代中国的文化优势地位，加上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浓厚“华夷意识”，使得自我中心思想极度膨胀。古代中国对“岛夷日本”十分蔑视，不愿意同时也认为没有必要进一步花费时间和气力去认识它。久而久之，这便积淀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心态，它让中华民族自身的优势得不到发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虽然时代在前进，文明在进步，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却越来越少。凡谈及日本，往往只会盲目套用祖宗传下来的有限知识，甚至不管是否符合日本当时的实际状况。

唐代以后，随着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繁盛，中国澄清了过去对日本的一些模糊观念，对日本的了解有较大发展。甚至对日本在工艺制作技术等方面的成就及土特产也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但总体而言，中国对日本的轻视心

态仍然存在。进入明代，中国实行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这让中国对日本的认识陷入停滞状态。等到“倭寇”骤起，并迅速成为这一时期最大外患时，中国才猛然醒来，匆忙组织力量展开对日本的“研究”。可惜的是，这一时期对日本的“研究”仅仅是为了应付日趋严重的“倭患”，因此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御倭方面，对于日本其他情况仍然基本沿袭《魏志》等书的记载，无视日本现状，以至于继续出现了很多错误记载甚至笑话。入清以后，在倭患平息和清政府实行严格海禁等一系列客观条件下，加上妄自尊大的华夷思想进一步盛行，使得中国人对日本再次陷于完全隔膜的状态，对其的了解又回到了明代以前的水平。

及至近代，日本的“突然”崛起，使不少中国人的日本观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由蔑视日本转为推崇日本，直到突破巨大的心理障碍，提出以日本为师的口号。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场历史罕见的留日运动在中国兴起，并很快发展成为一股狂潮。但是，近代留日学生的主要动机是希望以日本为“桥”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所以他们没能抓住留学这一有利条件开展对日研究。同时，由于近代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蔑，使得大部分中国留日学生对日本产生憎恶，再加上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骨子里保留的对日本的轻视心态，造成近代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和认识在整体上继续停留在表面状态。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面对残暴的日本军人，也曾试图去了解日本。但相对于同时期日本人写下的数量巨大的“中国学研究”著作，及有关中国的游记、小说、诗歌等被日本政府军方用做政治军事决策的参考依据这一现象来看，抗战时期中国对日本所作的了解远远落后于日本对中国的了解。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当代。“文革”前以及“文革”中，中国对日本的认识加入了过多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与日本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这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传统国民心态的原因。中国对日本民族性的错误认识，甚至影响到中国领导人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制定。“文革”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中国对日本的研究有很大进步，在慢慢深入。尤其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渐渐脱去了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认真而理性地去观察和解读日本，但还远远不够。有学者这样评价：“一方面，旅日学者在日本界非常活跃；而另一方面，中国对日本的研究本来最需要前沿学者的积极参与和发言，但却不见他们的动静，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相反，这些旅日学者进入日本学界、院校、影视界等，以专家的身份替日本分析中国问题，而且还是从内部、从自己的亲身经验谈起。这对于一向注重吸收外来文化的日本来说，更能够从对方活生生的解说中获取他们的感想、领悟乃至有关筹划，这使得我

们在两国的相互认识中处于不利的位置。

与此同时，历史上日本对于中国的认识，则经历了一个几乎完全相反的过程。

古代日本作为中华文化圈中的重要成员，一直深受着大陆先进文明的沐浴和熏陶。中国文化作为日本人及日本民族文化形成的主要渊源，渗透进了日本列岛历史上的每一个角落。古代日本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制度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同时，古代日本每时每刻都在感受着来自身边这个先进大邦——中国有形无形的“压力”，并不断地被激发起“危险”意识，造就了日本民族文化心态中奋发向上的超越精神。古代日本与中国的这种特殊关系，也使得古代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形成两个层面：

一方面，古代日本人对中国充满了憧憬和向往之情，把中国大陆视为文化的源泉和至高无上的圣地。这种仰视心理来自中国文化对日本源远流长又无孔不入的影响，来自两国文化的巨大落差。中国的一切在古代日本人眼中都似乎成为先进、神圣的化身，他们贪婪地摄取着中国的文字、服饰、习俗及各种文化制度，深入地观察着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变故，并加以详细记载。另一方面，古代日本人面对中国先进文化压力而产生的“危机感”，又促使他们在尊崇中国的同时，渐渐产生对中国的离心倾向。这种离心倾向随着日本文明的日益发展而不断被加强。当然，古代日本对中国的认识总体而言仍是以尊敬崇拜为主流，对中国的怀疑与离心，只不过是主流之下暗自汹涌的一股潜流。通过这股潜流，我们可以清楚地透视到隐藏于其后的日本文明程度的发展水平及深层文化结构的变动轨迹。

近代以后，情况发生突变。中国迅速落伍，短短数年时间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日本向西方学习，并成功进入近代资本主义强国，地位的转化促使日本人对中国的离心潜流迅速上升为表流，对中国的蔑视代替了昔日对中国的仰视。至抗日战争爆发，一系列针对中国的研究团体和机构涌现，其目的正是为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以便为蚕食侵略中国，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提供依据。进入当代，日本出于对华政策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全方位、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这使得日本成为举世公认的，除中国以外对中国研究最为透彻的国家。另外我们还应看到，在90年代后，因为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很多日本人被误导，习惯用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日两国今天的相互误读。

## 2. 日本形象形成的文化心态

从中日两国在相互认识进程方面的大相径庭，可以明显看出两国文化心

态上的巨大差异。总的看来，影响中国形成日本形象的文化心态有两个方面：

第一，妄自尊大的文化中心主义。妄自尊大是导致一个民族不能正确认识自己，也不能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的基本根源。长期以来，中国历代王朝天下共主的大一统思想，在促使古代中国人民民族自信心不断高涨的同时，导致他们对外部世界采取了漠视的态度。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其基本出发点仅仅是“华夷名分”，仅仅是为了满足大国虚荣，用猎奇的心理去获取外域的奇异风俗。因此在了解和认识日本时，其基本态度是消极、被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治学上虽然标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然而这一宗旨在探索外域时却常常被丢弃。通观历代史籍可以发现，中国人了解日本，要不就是机械地继承前代的日本知识，要不就是根据传闻和来华日本人所提供的零星情况，也不管其是否符合当时日本的实际，便载入史册。即使偶尔主动关心日本，也只是在日本对中国形成某种威胁或压力时，所采取的应急行动，但往往就事论事，浅尝而止。等到威胁一过，立刻复归于旧，从古至今莫不如此。因为日本人被视为“蕞尔岛夷”而不被认真了解，从而形成中国对日本认识的匮乏，并造成民族心态中的集体无意识及近代以后中国处处受制于日本的局面。其“流风余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当代中国人对日本的正确观察和深入研究，如“文革”时期认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日本人民在毛主席的指引下进行着伟大的革命斗争。由此可见，克服妄自尊大和自我中心思想，仍然是我们今天在认识外部世界时应继续予以注意的重要问题。当然，另一方面也决不能因此而自我菲薄，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只有不偏不倚，不戴任何有色眼镜，才能正确认识和研究外部世界。

第二，故步自封的文化精神。故步自封能严重影响一个民族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水平。它与妄自尊大思想紧密关联，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中缺乏进取精神的体现，是导致历史上中国对日本了解较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以客观条件而论，中国观察、认识、研究日本，具有其他国家和民族所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但中国对日本的认识，除开始最早值得“夸耀”外，近代以后很少再有领先于世界的研究成果，至今仍落后于欧美等地区。原因何在？进取精神的欠缺是首要因素。与此相反，日本对中国却始终保持了旺盛的超越精神。无论是古代对中国文化的摄取，还是近代以来对中国的研究，均是这种精神支配的产物。可见，对外部世界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和进取精神，无论在顺境或逆境的情况下，都不丧失信心，时刻保持“危机”意识，是一个民族走向世界的基本保证。

正是中国认识日本的这种文化心态，使得中国文人用本国的道德伦理、文化思想去衡量日本。在文化中心主义的绝对价值体系中，异国文化自身特有的现象都被强制性地剥夺了自身言说的权利，也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使得日本形象不能反映出日本真实的面貌。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文化中心主义、故步自封的文化心态在逐渐改变。中国越来越清楚认识到日本的重要性，对日本的认识也越来越理性，而中国文本中的日本形象也越来越接近日本的真实面貌。但比起日本人对我们的认识，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

## 第二节 中国文学中日本形象研究的意义

### （一）研究意义

第一，中国形象学研究的薄弱。“形象学”<sup>①</sup> (imagologie) 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门类，研究对象是某国某民族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异族形象。它关注作家在作品中，如何理解、描述、阐释作为他者的异国异族。它拒绝将形象看成是对文本之外的异国异族现实的原样复制，而认为它是一个幻象，一个虚影。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作者对他者的曲解、夸饰和想象是必然的。形象学的任务，就是探索异国异族形象的创造过程和规律，分析其社会心理背景以及深层文化意蕴。<sup>②</sup> 在当今多元文化并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背景下，形象学的研究对文化交流与对话，消除民族之间的文化误读与误解，正确审视和定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促进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无疑有重大的意义。

形象学有广阔的研究领域，在中外文学中，各民族之间的相互注视、评价比比皆是。欧洲文学中，荷马史诗《奥德塞》中的海上奇闻，《老实人》中的“黄金国”，《阿达拉》中的印第安部落，拜伦笔下的“东方”，吉卜林笔下的印度，劳伦斯、毛姆笔下的美洲及东方等，以及《马可·波罗游记》、

<sup>①</sup> 在这里，必须借用王向远先生在《比较文学学科新论》中提出的“涉外文学”概念。王向远先生用“涉外文学”的概念代替了“形象学”的概念，提出“涉外文学”涵盖了“形象学”的研究对象——异国形象与异国想象，但同时它又不局限于异国形象与异国想象。它包含了一个国家涉及另一个国家的所有形式的文学作品以及该作品的所有方面。

<sup>②</sup> 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第 220 页。



赛珍珠笔下的中国等。西方学者对异国异族形象的研究可谓是硕果累累。如弗朗西斯·约斯特把欧洲文学中出现欧洲核心国家民族以外的异族异国形象称为“异国情调”，认为欧洲航海民族自古对探索、冒险、发现的嗜好，可能是他们酷爱“异国情调”，进行十字军东征和传教，海外殖民，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深层心理基础。其研究方法对形象学贡献极大。<sup>①</sup>

中国文学中的异国异族形象从《山海经》起，在《史记》、唐传奇和唐边塞诗、宋爱国诗词、明清和现当代文学中俯拾皆是。但“形象学的研究迄今在中国仍是一片处女地：无论是中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还是异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几乎都无中国学者涉猎”<sup>②</sup>，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第二，当代日本形象研究的缺失。对于日本这个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国度，它的形象研究同样十分薄弱。200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sup>③</sup>填补了中国古代文学中日本形象研究的空白，但对于近现代以及当代的日本形象研究没有涉及。2007年出版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与实践：以中国文学中的日本形象为例》对中国文学中的日本形象作了初步的梳理，但梳理与分析都比较简单。总的看来，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仍然十分薄弱，还只有两三篇写个案文本的论文有所涉及。而从宏观涉及这个问题的，无论是书还是论文都没有出现。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本书不揣浅陋，试对中国当代文艺中的日本形象进行形象学分析，希望能对此研究领域起到投石引玉的目的。

第三，本书的现实价值作用。本书对于明确中国知识分子的义务和责任，更好地认识日本，更正确地理解中日关系，有着实际的应用价值。新时期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已今非昔比，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越来越复杂。那么，在这样一个新时期，中国人对日本有着怎样的认识和态度？这种认识和态度与中国的历史、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又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相信，现在回过头来对上述问题进行一次全面的考察，无疑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与日本交往，更好地对待异域文化，更好地发展自己。本书是从文学入手，中日文学的研究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政治和军事背景。所以本书的研究将为探讨中日关系打开一扇窗户。“文革”前以及“文革”中的

① 弗朗西斯·约斯特：《比较文学导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

② 陈惇、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77年，第180页。

③ 张哲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